

也谈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墓主和时代

刘照建¹ 边 策²

(1.徐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苏徐州 221009 2.徐州博物馆 江苏徐州 221009)

内容提要:北洞山西汉楚王墓与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相比,在墓葬的营建技术、结构布局和随葬器物等方面均具有发展至更高阶段的特点,因此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不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而可能是第四代楚王刘礼或第五代楚王刘道,其中第四代楚王刘礼的可能性较大。

关键词:北洞山 西汉 楚王墓 墓主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发掘,对于西汉诸侯王墓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徐州博物馆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共同编写的《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1]出版后,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思考。葛明宇、孙凤娟先生发表《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2](以下简称葛文,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简称北洞山汉墓),从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对墓主时代进行重新考订,认为墓主应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近日刘瑞先生撰文认为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墓主应为第一代楚王刘交^[3](以下简称刘文);而报告的编写者则认为墓主是第五代楚王刘道。考虑“北洞山作为首部公开发表的西汉楚王墓考古发掘报告,必将在今后相关研究和材料的使用中产生巨大影响”^[4],为此笔者不避重复之嫌,撰文一篇,供学界同仁参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刘文是在葛文观点认同基础上的深入研究,利用材料主要也是墓葬形制和钱币、印章,因此本文重点以葛文为对象进行商讨,兼及刘文谈到的一些问题。

徐州地区已经发现、发掘8处16座西汉楚王及王后墓,均为“因山为陵”的大型崖洞墓。虽然目前排序尚有分歧,但以墓主身份明确的龟山汉墓为坐标,可以将所有的楚王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且所有论者都一致认为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北洞山汉墓墓主应为西汉早期五代楚王中的三位,因此笔者拟将这三座楚王墓放在一起进行比

较研究,排出三座墓葬时代的早晚,从而确定北洞山汉墓的墓主身份和时代。单从三座墓葬建筑结构来认定墓葬的年代难免失之偏颇,如果从建筑技术发展特点入手,再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特征进行综合考察,则能够比较准确断定其时代先后顺序。

三座墓葬时代先后首先在开凿、装饰技术方面得到体现。狮子山汉墓开凿粗糙,除天井及外墓道经过打磨外,内墓道、耳室、侧室及后室等多处可见清晰的凿痕;狮子山汉墓墓室顶部结构单一,皆为平顶结构,且顶部与侧壁呈弧形连接,墓室给人的感觉是“洞”而非“室”,这说明在开凿技术上尚缺乏经验,在“室”的营建中理念尚不成熟。而驮篮山汉墓、北洞山汉墓则开凿技术成熟,墓室墙壁及顶部皆经过打磨,并以石粉、黄泥等拌成的粘土涂抹平整,外髹漆涂朱砂;墓顶形状复杂多样,有平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顶、盪顶等式样,突破了狮子山汉墓墓室单一平顶的形式,两墓墓室更具有“室”的概念和特征,崖洞墓的开凿和营造理念更加成熟,显示出开凿及装饰技术的高度发达,是崖洞墓发展更高阶段的生动写照。

其次设计理念和结构布局也能反映出三墓的先后顺序。狮子山汉墓突出特点是“大天井,小洞室”,即墓道与天井规模庞大,主体建筑相对狭小,内外颇不对称,在平面布局上比例失调,给人头重脚轻之感,这说明狮子山汉墓设计理念尚不成熟^[5]。

收稿日期 2009-06-30

作者简介 刘照建(1973~),男,徐州市文管办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汉代考古。

边 策(1963~),女,徐州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汉代文化。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第三批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西汉楚王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虽然狮子山汉墓墓室众多,但各室功能尚不完全清晰,除庖厨、仓储、武库、钱库等功能有所体现外,没有乐舞、厕间、沐浴等配套生活设施,而且整个墓室在平面布局上缺乏规划,仅在中轴线两侧开凿洞室,且开凿的随意性较大,种种情况表明狮子山汉墓正处于横穴崖洞墓的肇始阶段。而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则布局严谨,墓室分布疏密有致,除规模略小于狮子山汉墓外,规模庞大的天井已不再出现,洞室功能齐全,在狮子山汉墓原有各室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作为配套生活设施的洞室,如浴室、厕所、乐舞厅、水井等,几乎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地面建筑,充分表达了墓主人“事死如生”的理想。洞室的设置也不再仅限于中轴线两侧,出现布局复杂的“套间”,这说明两墓在设计上十分成熟,已彻底摆脱狮子山汉墓的窠臼,发展成为典型的横穴崖洞墓。此外墓葬封堵防护措施也能体现墓葬时代的先后,三墓除用大块塞石封堵墓道、甬道外,还为墓室设置墓门,而且在门的封堵设置上体现出技术的演进发展。狮子山汉墓虽然安装墓门,但是与门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发达,相反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墓门封堵方法则十分先进和科学,每扇门都有门槛、门扉、封门器和门轴窝,这也说明二墓时代晚于狮子山汉墓。

北洞山汉墓与驮篮山汉墓时代先后,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首先北洞山汉墓墓道底部低平,墓道开口在山脚下,墓室中出现墓柱,这均为后期楚王墓普遍采用的形式。其次北洞山汉墓主体洞室虽然呈轴对称分布,但在主体洞室左前方构筑了一大片附属建筑,打破了早期楚王墓皆轴对称布局的方式,而且整个建筑采用水平面高度逐次降低的设计方法,使这组庞大的地下建筑群主次分明,层次清晰,这是设计思想高度成熟的产物。而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皆为斜坡墓道,墓道开口均在山腰中部,且墓室均呈轴对称分布,具备早期楚王墓的诸多特点,这说明北洞山汉墓时代晚于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

另外,参照王后墓的形制特征也能确定三座墓的先后顺序。徐州地区早期楚王夫妇合葬墓,均同茔异穴,相距百余米,分立于两个山头,由于楚王夫妇死亡有先后,故墓葬形制也有明显早晚变化。狮子山楚王的王后墓位于其北侧羊鬼山上,据考古调查,墓葬形制与驮篮山汉墓完全相同,这说明狮子山汉墓与驮篮山汉墓时代接近,且前后有承进演变关系。北洞山汉墓东侧有“桓魋石室”,系北洞山楚王之王后墓^[6],与龟山二号墓形制非常接近,已具备西汉后期墓葬特征,这说明北洞山汉

墓时代接近龟山汉墓,因此北洞山汉墓时代晚于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

关于第一代楚王刘交的葬地,《后汉书·郡国志》引《北征记》曰:“(彭)城西二十里有山,山阴有楚元王冢。”《魏书·地形志》亦云彭城有“楚元王冢”,《水经注·获水》则载有“获水又东迳同孝山北,山阴有楚元王冢。上圆下方,累石为之,高十余丈,广百许步,经十余坟,悉结石也”。多部文献明确记载楚王山有刘交墓,这些著述成书年代距西汉较近,所言之事应有所本。近年来我们在对楚王山汉墓调查中,发现该墓具有西汉早期楚王墓的诸多特征,如墓葬主室规模庞大,有斜坡墓道,甬道短、墓道宽,附属墓室少,墓室简易,仅发现3个耳室(应为4个耳室),其在山顶上营建竖穴崖坑的方式,与其他地区汉代早期竖穴土坑墓形制相同;墓内出土的铜、铁、陶瓷、漆器等文物,均具有西汉早期的特征,个别铜器上带有“楚”字铭文,表明楚王山一号墓墓主为西汉早期楚王。此外楚王山汉墓群所占山体最为高大,位置在已发现诸陵中最靠西,古人以西为上,可见墓主生前地位显赫,唯有楚元王刘交与之相称,因此楚王山汉墓墓主为第一代楚王刘交可能性较大^[7]。

综上所述,考虑楚王山汉墓的存在,北洞山汉墓墓主不可能为第一代楚王刘交,三座楚王墓的墓主应该分别是二、三、四、五代楚王之一,其排列先后顺序为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北洞山汉墓,因此北洞山汉墓墓主只可能是四代或五代楚王。

至于葛文中关于墓葬建筑结构的分析排列,虽然听起来颇为合理,但实质存在重大问题。葛文将墓葬建筑结构作为判断墓主身份及时代的重要依据,指出北洞山汉墓复杂的外部结构、三重内收的外墓道、两米见方的主墓门及甬道、前堂后室的主体墓室结构,无不显示出西汉早期楚王墓特有的时代特征,然而这几点均为西汉早期三墓共有的特征,根本不能作为确定三墓顺序的依据,更不能因为北洞山汉墓具有这些特征,而认定其为二代楚王墓。

其次葛文强调“北洞山汉墓凿砌结合的构筑方式,更明显表现了西汉楚王墓形成和发展初期的不成熟性,考古发掘表明,徐州地区西汉楚王崖洞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凿砌结合到完全开凿的过程”。事实上,北洞山汉墓的凿砌结合形式,在徐州地区楚王墓中仅是个孤例,没有任何考古发掘能够证明存在这样发展过程,相反米山汉墓群^[8]、后楼山汉墓群^[9]等大量竖穴崖洞墓的发掘,则表明凿砌结合构筑方式从早到晚都存在。其实

砌筑基室做法倒接近龟山汉墓墓内搭建建筑的做法,因为凿砌结合是追求墓室更完善美观的表现,是建筑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可以视同龟山汉墓发展的前奏,事实表明北洞山汉墓附属墓室凿砌结合的构筑方法,是非常先进和科学的,直到今天墓壁和墓室顶部还没有任何移位或坍塌,不能因此将墓葬时代定在西汉初年文帝时期。

另外葛文认为北洞山汉墓时代靠前的原因是与狮子山汉墓相似地方颇多,如两墓均有三重墓道,都有庞大外部结构,墓门之外皆有耳室建筑,从而认定两墓之间具有一定的前后承继关系,仅在段尾指出北洞山汉墓出土大量文物时代早于狮子山汉墓,而草率定其早于狮子山汉墓,事实上两墓之间虽然存在相似之处,但内涵却并不相同。狮子山汉墓墓道开凿伊始,由于石质差而被迫放弃,形成多重墓道,而北洞山汉墓墓道两侧以阙的形式出现,则是为了更加真实地模仿地面建筑,表达庄严肃穆的效果,与狮子山汉墓三重墓道意义完全不同;狮子山汉墓外部结构庞大,但并不复杂,墓室布局有着简单、随意的特点,天井占整个工程量2/5,体现出崖洞墓早期的诸多原始特征,而北洞山汉墓外部结构的处理则十分高明,墓门以外耳室已缩减为长1.9、宽0.9、高0.9~1.0米的小龕,这与狮子山汉墓的耳室已有很大不同;北洞山汉墓位于主体建筑东南的附属建筑群虽然复杂,但入口处理得非常巧妙,仅由长4.6、宽1.82、下降深度达2.98米的楼梯形甬道相连,甬道入口又用石块严密封堵,这种处理方法的隐蔽性显然并不逊色在甬道以内设置侧室,配套建筑群虽在主体墓室的甬道外,但实际内涵已超过简单在甬道两侧开凿侧室,虽然在外但已有“内”的意味,因此两墓外部结构虽然有些相似,但本质上却有很大不同。葛文将北洞山汉墓时代定在狮子山汉墓之前欠妥。至于出土文物的时代特征,更不能证明北洞山汉墓早于狮子山汉墓,笔者将在下文通过对三墓出土的时代特征明显的文物的比较作进一步论述。

最能准确断定墓主身份的是墓主本人的印章,龟山汉墓出土的龟钮银印,毫无疑问地将龟山汉墓墓主锁定为第六代楚王。如果没有标明墓主身份的印章,其他具有纪年意义的钱币等文字材料也颇受研究者青睐。葛文就是从随葬的钱币和印章等相关材料入手,对墓主考证作出推断。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随葬钱币等相关材料断代仅能确定墓葬时代的上限,而不能准确断定墓葬时代。我们注意到葛文存在的问题是将钱币、印章的时代与墓葬时代等同,且以钱币、印章出现时代认定墓

葬的下限。

葛文通过对北洞山汉墓半两钱的研究,仅从北洞山汉墓所出四铢半两与制作规整的标准文帝四铢半两有差别,从而断定这批钱币绝非文帝四铢半两,并将其定为战国末年和西汉初年铸行的轻劣小半两和减重八铢半两,结论显然过于简单。刘文的分析研究则更为深入,指出报告中C型钱币分型混乱,分型标准不具有排他性等问题,但二者皆忽略这样一个重要史实,文帝时期实行钱币放铸政策,《汉书·食货志》载:“孝文五年(公元前175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正是这种“使民放铸”政策,使得造币单位多,标准不统一,钱质良莠不齐、粗劣不规整现象难免出现,尤其是郡国四铢半两未界定的情况下,不能由于北洞山汉墓半两钱与文帝标准钱有差别而因此否认其不是四铢半两。其次葛文将钱币时代考订后,就将墓葬时代的下限定在公元前175年,其实即使确定钱币时代为公元前175年之前,也只能确定墓葬时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年,而不是下限,因为钱币随葬的原因非常复杂,后代墓葬随葬前代钱币现象十分正常。

至于印章断代也存在同样问题,报告的编写者为了证明墓主是第五代楚王刘道,而推定印章时代偏晚,葛文则对此进行了指正,认为印章时代明显具有西汉早期偏早特征,刘文也赞同这一观点,这诚然不谬,但是这也仅能够确定墓葬时代上限不早于西汉早期。至于这批印章的性质和来源,我们认为不可能是属官的印章,这是由汉代严格的用印制度所决定,如刘文所言:“从秦汉印章制度看,印章是职官象征,见印即为见官,去印即为去官。”^[10]也可以这么说,无论这些属县是否属楚,属县官吏的印章都不可能随葬入楚王墓,削地与否和印章入葬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以印章反映的属县名称的有无与“七国之乱”楚国削地联系起来确定墓主时代的根基不牢。公元前154年吴楚之乱后,诸侯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已收归中央,无论削地与否,楚国已不可能再制作这些印章,这些印章只能是汉初楚国管辖时所制作,这些印章为什么留在楚国而又葬入北洞山汉墓,原因已不可知。作为景帝时期斗争的焦点,削地夺印是必然的,但是在具体操作中是否将重复的印章留下了呢,或者移交时少交或漏交呢?目前学界对这些印章是由于政治原因的前代遗留均没有疑义,这些印章均为前三代楚王时期的实物,时间延续从公元前179年至前154年,因此这也仅能够确定墓葬时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9年。由此我们认为楚王随葬的钱币

和印章二者的学术意义仅仅是确定墓葬的上限,即墓葬时代不早于公元前175年。

另外以时代特征明显的陶俑为例,徐州地区陶俑发展自成系列,发展轨迹十分清晰,经历体形由小到大,脸型由倒三角形向椭圆形发展的过程^[1]。狮子山汉墓出土的150余件小陶俑,面部呈倒三角形,高仅10余厘米,制作简单粗劣,且种类单一,以侍俑为主,不见乐俑、舞俑。而驮篮山汉墓、北洞山汉墓则发现大量乐俑、舞俑,种类繁多,造型匀称,且陶俑体量大,高达50厘米左右,面部已开始由倒三角形向椭圆形过渡,因此狮子山汉墓时代早于驮篮山汉墓、北洞山汉墓。另外驮篮山汉墓与狮子山汉墓发现完全相同的跽坐俑,均存在俑坑陪葬现象;但北洞山汉墓则未发现俑坑陪葬,也没有与狮子山汉墓相同的陶俑,且北洞山汉墓陶俑种类比驮篮山汉墓更多,特别在龕内出土222件彩绘陶俑,装饰复杂,制作精美,更是驮篮山汉墓所不见,这说明北洞山汉墓时代又晚于驮篮山汉墓,因此通过陶俑也能排定这三座墓时代的先后顺序。

其实关于北洞山汉墓墓主归属问题争论已久,自发掘之日便产生分歧。最初发表的简报推定墓主是公元前175年至前128年之间的刘郢客、刘戊、刘礼、刘道四代楚王之一^[12],后发掘者之一邱永生先生认为北洞山汉墓墓主为第二代楚王可能性较大^[13],其主要证据是存在削地之前的印章。但是随着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发掘,研究者能够更加全面地考察三墓的时代和顺序,北洞山汉墓墓主问题逐渐清晰。1997年12月,徐州市又专门召开以西汉楚王墓墓主序列为主题的讨论会,一些学者对此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观点^[14],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北洞山汉墓发掘报告应该是十分成熟和慎重的,作出墓主是四代或五代楚王的判断是

比较接近真实的。但笔者以为,首先北洞山汉墓墓葬形制与龟山汉墓相差较大,北洞山汉墓更多表现出前期特征,仅具有少量后期元素;其次北洞山汉墓与龟山汉墓的出土文物之间差异较大,中间似乎缺乏过渡;第三北洞山汉墓钱币不能确定存在武帝时期的四铢半两,因此综上定墓主为四代楚王刘礼更为恰当。

- [1]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 [2][4]葛明宇、孙凤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第7版。
- [3][10]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
- [5]刘照建:《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天井成因考—兼谈西汉横穴崖洞墓的起源》,《考古》2006年第3期。
- [6]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文物》2001年第10期。
- [7]刘照建、梁勇:《徐州铜山县楚王山汉墓群考古调查》,《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
- [8]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米山汉墓》,《考古》1996年第4期。
- [9]徐州博物馆:《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4期。
- [11]张玉、刘照建:《徐州地区西汉陶俑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2年第11期。
- [12]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
- [13]邱永生:《徐州北洞山西汉王陵考略》,《徐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3、4期。
- [14]王中文:《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

On the Owner and Age of the Tomb of Prince Chu of Western Han at Beidongshan

LIU Zhao-jian¹ BIAN Ce²

(1. Heritag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Xuzhou, Xuzhou, Jiangsu 221009

2.Xuzhou Museum, Xuzhou, Jiangsu 221009)

Abstract: Comparing with the tombs at Shizishan and Tuolanshan from the construction, forms and funeral objects, the tomb of Prince Chu of Western Han at Beidongshan reached a higher stage of development, so its owner shouldn't be LIU Ying-ke, Prince Chu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but probably the fourth named LIU Li, or the fifth named LIU Dao. And it is more probably LIU Li.

Key words: Beidongshan; the Western Han; tomb of Prince Chu; tomb owner